

世俗情趣、財富與新審美觀—— 中國三代時期金器介紹 *

李建緯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藝術創作理論所博士班

g880201@mail.tnnua.edu.tw

黃金作為人類最早使用的金屬，也是最珍貴材料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歐洲，已有大量使用金器的考古證據。西方世界中，黃金不單單是一種材質，更累積了厚重文化內涵，而具有階級、財富、與不朽的象徵。相較於黃金在西方的地位，在東方的中國此地，「玉」則扮演著與西方黃金互相輝映的同等重要性。撿拾或採於山川之間、具溫潤通透青綠質感的玉，深受中國人的愛好，並在集體意識中形成對玉的信仰；到了夏商時期，青銅鑄造容器的加入，使得原本獨大的玉器，逐漸層層剝去神秘性與宗教性，而青銅容器則取代玉器作為權貴表徵之首選。雖然黃金在某些器用上亦展現其優美的品質，然而，在中國上古歷史中，它並未取代玉和青銅，以作為永恆、宗教與王權之象徵。

然而，若放進整個中國長久用器歷史中來看，黃金從原本的純裝飾性也慢慢被賦予神秘性、社會性、宗教性，開始與玉比美；甚至也逐漸成為青銅彝器表面敷色首選，三代時期正是此一轉變的關鍵。到了秦漢時期，黃金甚至有凌駕美玉的趨勢，而成為隋唐時期金銀器大盛之準備。某些學者認為中國三代金器並無特殊的表現，然隨著近年來陸續出土的考古材料，使得人們開始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上古金器發展。

壹、黃金性質

黃金性質與它作為器物的形態，有著不可分的關係。

在門捷列夫周期表中，黃金的原子序數為 79，即金的原子核周圍有 79 個帶負電荷的旋轉電子，因此，金具有很好的化學穩定性。就質量而言，黃金很重，其密度為 19.32 克/釐米；亦即是說，直徑僅為 46 毫米的純金球體，其重量就有 1 公斤。然而，在自然界中如此高純度

* 本文多數觀點主要來自 Emma C. Bunker, "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 in *Artibus Asiae*, vol.53, 1/2, 1993, pp.27-50.一文、以及黃盛璋著，〈論中國早期(銅鐵以外)的金屬工藝〉，《考古學報》，1996：2，頁 143-145。

的黃金幾乎是不存在的。由於黃金易磨損，變成極細的粉末，因此黃金常以分散狀態廣泛分佈在自然界中。自然形態的金易加工，其成份經常摻雜有從 1%-80%的銀，以及少量的紅銅。就目前研究現況來說，整個中國完整的科學成份分析資料庫建立之前，是無條件進行此階段研究。

此外，就質地而言，黃金是一種很柔軟的金屬，然不及鉛和錫兩種金屬，在純金上用指甲可劃出痕迹，這種柔軟性使黃金非常易於加工；然而，這一點對裝飾品製造者來說，又很不理想，因為這樣容易使裝飾品蹭傷，使其失去光澤以至影響美觀。所以在用黃金製作首飾時，一般都要添加銅和銀，以提高其硬度。

由於黃金易鍛造、易延展，可碾成厚度為 0.001 毫米的透明和透綠色的金箔，而 0.5 公克的黃金可拉成 160 公尺長的金絲。這可解釋為何黃金常以金箔形態貼於器表；或是以紐絲成辮的方式成環。

黃金的熔點為 1063°C，熔融金有較高的揮發性，隨著溫度的升高，其揮發性不斷增強。純金的抗壓強度為 10kg/mm²，其抗拉強度與預處理的方法有關，一般在 10-30kg/mm² 之間。冷拉金絲時，受力最大。

就外觀而言，純金有著極好看的草黃色金屬光澤，可說在所有金屬中，黃金顏色最黃，亦最醒目，因此黃金常被聯想成太陽；而且它不易氧化的性質，使得許多文化都將它看成是不朽的象徵。

根據艾瑪·邦克(Emma Bunker)研究指出，中國古代金子的主要來源似乎都是沖積地點，我們稱為砂金。雖然文獻記載在西周早期有銅礦的存在，但唐代以前的金礦證據實鳳毛麟角，金的來源在許多中國早期文獻均有提及，但地點總是不清楚。此外，記載古代中國用「金」的參考文獻也語焉不詳。「金」這個字，今日指的是金子，但在古代也用來指紅銅與青銅。雖然《詩經》上曾有「潔如『金』」、或是有鍍金之馬環的記載，我們卻不能將之視為是文獻描述的金之證據。

到了戰國時期，「金」的文字意義就比較貼近今日的意思。成書於西元前三世紀的《爾雅》中，金特別被指出是「黃金」，相對於用來作為「白金」的銀。「金」字特定化的用法亦見於《戰國策》、以及其它一些戰國或漢代文獻。這些文獻都指出金的高度價值與可獲得性。

貳、三代中原地區使用金器之面貌：從配角到主角

中原地區使用金的最早證據大抵是在商代，主要係以錘打方式打成箔片，貼於器物表面作為裝飾，此稱為「包金」。在安陽侯家庄 M1001 武丁等幾個被盜的商王大墓均發現有數片金箔；在河南鄭州、河北台西商墓、山東益都蘇阜屯、河南輝縣琉璃閣，安陽薛家庄及大司空村，也都陸續發現有金葉或金箔。雖然商代出有金箔的墓等級均不小，但是整體而言，代表禮制與身份地位的，仍來自於青銅容器與玉器數量與精緻度。以武丁配偶安陽婦好墓為例，750 件玉器與 468 件青銅器驚人數量，卻未出任何金器。

到了西周，金的用法雖沿續了商代作法，被拿來作為器物或建築表面的局部裝飾，如河北省琉璃河的西周燕國墓出土的一件漆觚，其上飾以金箔片與綠松石。但自西周晚期，黃金開始擺脫金箔裝飾器表一貫作法，而以鑄造方式呈現，如山西天馬曲村晉侯 M8、河南三門峽虢國墓 M2001 等國君級墓【圖一、圖二】，均出有與青銅器形制一致的金腰帶飾與盾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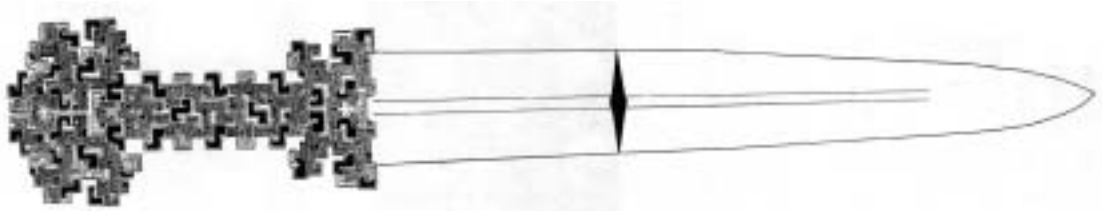


圖一：三門峽虢國墓 M2001 出土金腰飾(三角龍形帶飾) 圖二：三門峽虢國墓 M2001 出土金腰飾(獸首形帶扣)
圖版來源：《三門峽虢國墓》，彩版一二之 1 圖版來源：《三門峽虢國墓》，彩版一二之 2

東周時期周王室已式微，不存在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中國各地不斷成長的地方勢力，以及封建諸侯國的競爭下，刺激了黃金的使用量，並尋求新的冶金技術，例如鑲嵌黃金(或稱為錯金)與鑲金等技術的發展，以滿足此時的奢華品味。

首先先看陝西秦國的用金情形——鑄金技術在此也被廣泛地運用。秦國佔領了周早期地區，並持續與其西北邊的游牧民族持續接觸，而游牧民族對黃金的偏愛可能影響了秦人貴族大量用金的品味。在西安近郊鳳翔的秦景公墓中(B.C.577-537 年)，發現有一件鑄造金虎、一件黃金鳥杖首、以及帶有鴨首勾的金質帶釦。在鳳翔西村的另一座秦墓也發現有飾以假穀粒樣式(pseudo-granulation patterns)的金飾件，而這種假顆粒紋被視為是游牧民族偏愛的裝飾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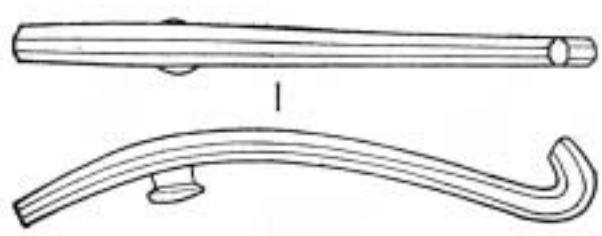
題。最值得注意的是，陝西寶雞南邊益門村發現的二號墓，發現有總重 3000 公克的金器：在二百餘件組的秦遺物中，大約一半是黃金製品(104 件)，包括有腰帶鉤、腰帶扣、鈴、串珠、圓泡、金柄鐵劍【圖三、圖四】…等。稍晚於秦益門二號墓的山西太原趙卿墓【圖五】，在金屬數量上雖略遜一籌，但幾件精緻的黃金帶鉤與錯金帶鉤，則為前者所未見。



圖三：陝西寶雞市益門村秦墓出土金柄鐵劍
圖版來源：《文物》，1993：10，頁四(圖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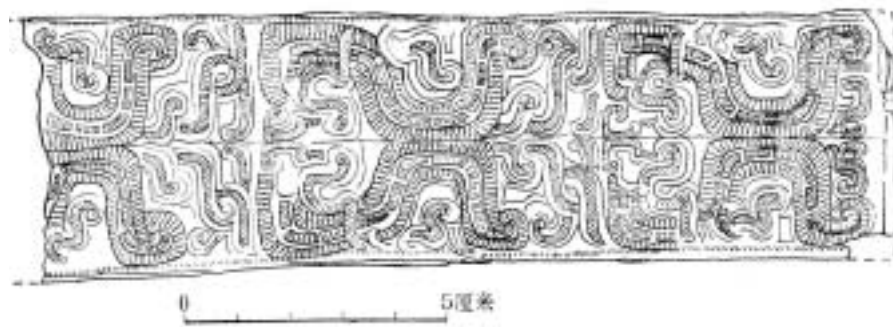


圖四：陝西寶雞市益門村秦墓出土金柄鐵劍
圖版來源：《文物》，1993：10，彩色插頁一



圖五：山西太原趙卿墓 M251
圖版來源：《太原晉國趙卿墓》，圖版一一三之 1，圖 87-1

位於南方楚地，在用金的情形亦有不遜於北方之表現。河南淅川下寺一座楚國宰相墓(春秋晚期)，出有 192 片的各種形狀金箔【圖六】；楚北邊戰國時期小國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也發現為數不少的金器：金盞【圖七】、雙耳金杯【圖八】、一件長柄勺、幾件帶鉤，還有大量錯金的青銅器。這些金器是係日常使用的個人用品，在墓中並未與主要青銅禮容器放在一塊兒。



圖六：河南浙川下寺 M2 出土長方形金箔線繪圖
圖版來源：《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圖 151 之 1



圖七：河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金盞與金勺
圖版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6・戰國地下樂宮，圖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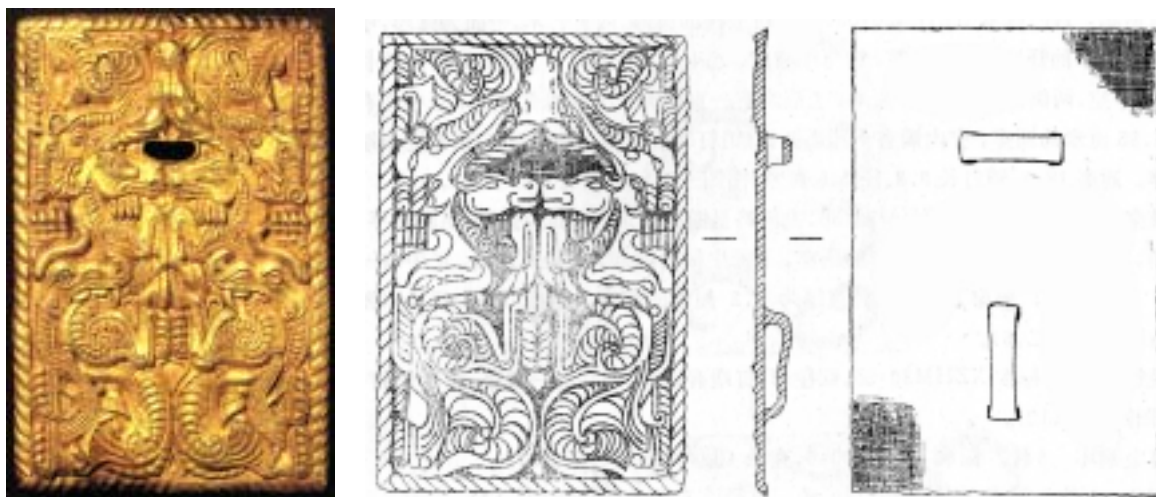


圖八：河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雙耳金杯
圖版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6・戰國地下樂宮，圖 51

至戰國時期，墓葬中則充塞大量的奢侈品：上從傢俱擺設貼金、帶鉤鑲嵌有貴金屬與半寶石，下至各式個人配件、車馬具，莫不以黃金裝點，以追求華麗視覺效果；在西元前四世紀的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正可說明此點【圖九】。中山王係由白狄分支的鮮虞族建立，並採納中原文化，卻仍保有「蠻族」品味。另外，位於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交界的戰國晚期的河北易縣燕下都一座戰國大型墓，出土近百件的金器，多數具北方游牧民族器物特色【圖十】。值得注意的是，此墓不見有青銅禮容器，卻出有大量的陶質容器，而銅器亦多以器表鑲嵌金銀者為主。



圖九：河北平山縣中山國王墓出土金銀狗項圈
圖版來源：《戰國中山國王之墓》(下)，彩版一八之 4



圖十：河北易縣燕下都辛庄頭 M30 長方形牌飾 彩圖與線繪圖

圖版來源：《燕下都》（下），彩版 27；《燕下都》（上），圖 418-1

東周時期對黃金的使用，除了以黃金為器、或是貼金之外，最重要的黃金技術係鑲嵌金銀：¹自春秋晚期以降，金銀錯開始大量使用於青銅容器表面、個人配件與車馬器上；而鑲金的使用更是黃金工藝的重大突破，²自戰國晚期鑲金已完全取代金箔，作為改變青銅器外觀的一種手段。

如前文一再提到的，東周時期對金逐漸增加的狂熱，反映在諸侯的日常用品消費上。這種狂熱係出於他們與游牧民族接觸時，受到這些民族將宗教信仰與個人身份表徵表現在金製品上的影響，因此黃金很快地成為東周的奢華物件。曾侯乙墓中的金容器反映的是世俗面而非禮制面；黃金鑄造帶鉤或牌飾亦宣示了其擁有者的財富而非信仰，政治與威望是他們的主要關心層面。

參、中原周邊地區金器使用狀況

從大量金器的考古發現顯示，西元前二千至一千年前，商周中原以外的異邦使用金器的現象早已存在：根據碳十四測定為西元前十六世紀的甘肅玉門火燒溝墓地，已發現金、銀、青銅等材質之耳環；北京雪山遺址也發現有喇叭形金耳環。在北京平谷縣劉家河商代早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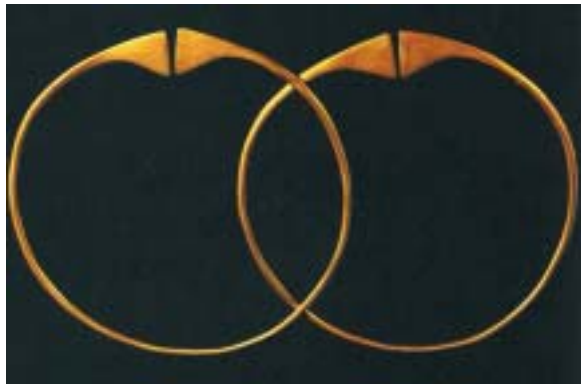
¹ 又稱金銀錯，此工藝始於春秋，至戰國中達至鼎盛之一種青銅工藝技術。通常作法是在鑄造青銅器時，預先於器表鑄出淺凹之銘文或紋飾；部份精細者難以鑄造完成紋飾，則於銅器表面鑄成後再以工具刻上，形成凹槽，然後在這些凹槽內嵌入金銀絲或金銀片，再以錯(厝)石以其它材料將器表打磨平滑。此工藝最早見於兵器、後來開始興盛於青銅禮器上。採用錯金銀之器物，也由兵器、禮器普及到樂器、節符、璽印、車飾、帶鉤、銅鏡等日常用品。

² 鑲金是先把鍛成金箔的黃金剪碎，放入坩鍋加熱至 400℃ 後倒入汞，通過攪動使汞相溶，形成銀白色之「金泥」，然後將金泥均勻地塗到器物上用炭火烘烤，金泥中的汞質烘烤中蒸發，器表上只留下黃金，金泥顏色也由最初的銀白色變成金色，再經刷洗、壓光後即完成鑲金工藝。此項工藝適用於紅銅、銀與含鉛、錫量不超過 20% 的青銅器

葬中，發現一件金耳環、金臂釧與金筭，據測定含有 85%金及微量銅元素。該耳環末端作漏斗狀【圖十一】、而金臂釧兩端則呈扁平扇狀【圖十二】；在遼寧夏家店下層文化也曾發現同樣形制的青銅耳環。Emma Bunker 認為這種形制的耳環來自於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山地區東北部的安卓諾佛(Andronovo)文化的物品，或是來自於西伯利亞西邊的湯姆斯克(Tomsk)、甚至是更西沿著烏拉山脈(Ural)山腳阿姆河(Amu)-達亞河(Darya)地區。



圖十一：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 金喇叭形耳飾



圖十二：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 金臂釧

在四川，年代約商晚期的廣漢三星堆祭祀坑與成都金沙遺址，亦發現有大量的金箔與貼金器。三星堆金器有金箔金杖、虎形金箔、金箔葉形飾以及貼金的青銅人面；文化類型與三星堆接近的金沙遺址出土金器，在類型上則更多樣：人面、刻紋金帶…等，多數是以錘碟成形，作為器表裝飾用途的。



圖十三：四川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 金箔虎形飾
圖版來源：《三星堆祭祀坑》，圖版 11



圖十四：四川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 貼金青銅人面
圖版來源：《三星堆祭祀坑》，圖版 50

在中國東周時期的北方邊境，黃金極受到當地遊牧民族歡迎。中國東北寧城小黑石溝、北京延慶軍都山、內蒙鄂爾多斯、西溝畔匈奴墓…等畜牧或游牧民族地區出土不少金耳飾、

動物形牌飾、動物型立雕金飾…等。這種以動物為裝飾母題的手法，學者稱之為「動物式風格」(animal style)。特別是動物形牌飾，一般咸認為它的使用係受到活躍於西伯利亞草原的斯基泰人影響【圖十五】。



圖十五：內蒙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 虎咬牛紋金飾牌

圖版來源：《草原瑰寶·內蒙古文物考古精品》，頁 83

學者指出，某些北方游牧民族金牌飾，事實上係由中國工匠製造，並交易至鄰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如同希臘為其鄰邦斯基泰民族製作金器一般。西溝畔發現的兩件西元前三世紀的牌飾，背面文字指出黃金器之重量。前文指出的河北燕國下都辛庄頭戰國墓，多數金器之背面都刻有燕國文字，載明其燕制的重量。

過去我們那種以線性觀點來看中原地區藝術發展的態度，隨著文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與豐富考古材料的加入，使得這樣的觀點已不再適用。中原諸多藝術表現，特別是金器，並非閉門造車造車式的埋頭苦幹：它的發展是在自身基礎上，受北方游牧民族對以金器為首的個人裝身具偏好之影響，從而改變了中原地區用器的態度。因此，以來黃金裝飾器表與個人身體，以彰顯世俗情趣的作法，透露的正是個人意識的抬頭、新審美觀的出現，以及禮制衰敗的事實。

肆、結論

從可獲得的考古證據顯示，透過與鄰邦少數民族的接觸，中國古代最初對黃金興趣的抬頭，約晚至西元前 2000-1000 年間。西元前 1000 年以後，中原與鄰邦之國進一步的交流，刺激的裝飾用黃金量的增加，並用金色裝飾器表。不同地區的勢力下，大量的世俗品味被培養，使得他們一致地接受此波藝術潮流，使得黃金的使用迅速地被中國化。戰國晚期以及秦漢時期，金不僅具裝飾性，還具財富與權勢象徵，與玉器同樣作為一種防止衰敗的護身符。

相較之下，在北方少數民族中，金器不僅只是地位象徵。金馬具與個人佩飾所呈現的莊嚴設計，反映了其擁有者在神話學上的信仰、氏族的成員資格以及其地位。金冠、牌飾與首飾可能曾經是王族的標幟，透過它，酋長展現其統治權。